

Unsteady State Im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态转移

——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与现状调查

主 编 / 赖涪林



上海财经大学“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资助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802)资助

(

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态转移

——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与现状调查

主 编 赖涪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态转移: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与现状调查/赖涪林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5642-0508-9/F · 0508

I. 长… II. 赖… III. 农民-流动人口-关系-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长江三角洲 IV. C924.24 F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4297 号

责任编辑 张小忠 张 健

封面设计 张克璠

CHANGSANJIAO NONGMINGONG DE FEIWENTAI ZHUANYI
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态转移
——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与现状调查
主 编 赖涪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27.75 印张 426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定价: 39.00 元

前　　言

当本书付诸出版的时候,大批农民工兄弟正不得不告别他们已经打拼多年的城市和工厂,重新回到故乡城镇长长的求职队伍中间。此时,我们的心情与他们一样沉重。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正确地告诉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当两年多以前,一些知名学者因为“民工荒”等现象而断然宣告“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将在5至8年之后消失,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不大,中国也不会光靠劳动力价格优势来吸引外资时,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但却不能系统地对这一问题作出理性的研判。

同样是两年多以前,上海市有关部门希望我们研究“孟买现象”,还有人非正式地提出我国农村劳动力应该分梯度转移,不应该让大量低素质的人口涌入大城市的主张的时候,确实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但却没能给出很有说服力的答案。

今天摆在您手中的这本书,是汇聚了我们将近三年时间的劳动成果。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从“非稳态转移”的理性探索中看到了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路径。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只能从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与现状调查等方面,给出我们对农村劳动力非稳态转移的一些初步的和粗浅的认识。希望它能给您一点启发,也许还能引起您的共鸣,让您与我们共同思考、研究,与我们商榷和辩论,甚至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学术批判。

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农

长三角农民工
非稳态转移

前 言

工问题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空前关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历来注重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强化应用研究能力，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服务，立即动员我们投入长三角农民工状况综合调研预研究，学校有关领导也立即为我们配套了必要的调研经费。在学校和研究所各级领导的鼓励、帮助和督促下，这些无比宝贵的调研经费支撑我们一直走到了今天。

本书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由赖涪林拟订，并经丛树海教授和赵晓雷教授严格把关。总报告由赖涪林撰写，张锦华博士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

专题研究部分由多位在相关研究方面有一定积累的学者分头组织撰写。其中第一专题第一报告和第二报告分别由赖涪林和张祥建博士负责撰写。第二专题第一报告由张锦华博士负责撰写，第二报告由赖涪林和张锦华博士共同撰写。第三专题第一报告由刘志平博士负责，硕士生李倩和温芬参与了部分写作；第二报告由赖涪林与何俊博士共同撰写，硕士生朱娴贤参与了部分写作。

现状调查部分统一由赖涪林设计问卷和调研提纲，并组织调研、资料和数据整理、分析以及调研报告的撰写。

其中综合调查篇第一报告的调查和数据录入者为赖涪林和财经研究所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2004 级硕士生康焱、2005 级硕士生宋明、张汀汀、常莉莉，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康焱、宋明、李刚（本校统计系 2008 级硕士生）。第二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校团委和财经研究所联合组织家在各城市的 23 名本科生分头调查并自行录入数据，报告撰写者为李刚、赖涪林。第三报告由赖涪林带领财经研究所农业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等专业 2006 级的 16 名硕士生开展调查和数据录入，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和本校统计系 2007 级硕士生邵永泉。第四报告通过上海财经大学校园网招募本校博士生刘明，硕士生郑向沫、毛曦、金正浩（韩国），本科生张宵、蒋艳、沈君，以及财经研究所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2007 级硕士生饶颖、田后元、顾殊黎、徐珊珊（区域经济专业），由赖涪林带领开展调查，饶颖、田后元、徐珊珊、金正浩和赖涪林参加数据录入，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和本校金融学院 2006 级本科生魏袆。

专题调查篇的第一报告主要由财经研究所部分老师和学生分别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发放和收集问卷,通过上海财经大学校园网招聘 12 名硕士生和本科生参加数据录入,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蒋艳(本校统计系 2005 级本科生)、李刚。第二报告的调查与综合调查篇的第三报告共同进行,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第三报告的文献调查和现状调查主要由本校公共经济管理学院 2008 级本科生王袆璐和财经研究所 2008 级硕士生顾光臣等担任,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顾光臣、王袆璐。第四报告的调查与综合调查篇的第四报告共同进行,报告撰写者为赖涪林。

个案调查篇由赖涪林组织饶颖、李芸、田后元、张露、顾广贤、顾殊黎(均为财经研究所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2007 级硕士生)开展调查访谈和记录整理,文字加工整理者为赖涪林和本校金融学院 2006 级本科生张继杰。

全书照片由赖涪林提供。

编写者

2009 年 2 月于上海财经大学

目 录

前言/1

总报告:长三角区域农村劳动力的非稳态转移考察/1

 第一部分: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稳态转移的理论探讨/3

 第二部分:长三角农村劳动力非稳态转移的实证研究与现状考察/16

实证研究篇:从产业、农民工与政府的角度看非稳态转移/33

 第一专题:产业的角度——产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35

 第一报告:长三角经济吸收农村劳动力现状考察/35

 第二报告:劳动力流动与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51

 第二专题:农民工的角度——人力资本投资与新生代农民工/80

 第一报告:非稳态转移条件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溢出效应/80

 第二报告: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素质提升/101

 第三专题:政府的角度——公共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122

 第一报告:长三角的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农民工问题/122

 第二报告:长三角城市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管理的制度安排/152

综合调查篇:长三角区域农民工现状综合调查/173

 第一报告:上海等五大主要城市农民工基本情况综合调查/175

 第二报告:无锡等其他八城市农民工基本情况综合调查/232

 第三报告:苏州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两次调研的比较/265

目 录

第四报告:上海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两次调研的比较/283

专题调查篇:长三角产业与城市吸纳农民工的作用与局限/299

第一报告: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与农民工流动/301

第二报告:苏州工业园区外资企业利用劳动力现状调查/321

第三报告:长三角部分城市“新市民运动”开展情况/341

第四报告:2008年上海农民工春节返乡情况调查/364

个案调查篇:不同产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实际状况/371

不同产业农民工融入城市现状个案访谈的基本情况/373

第一类:加工制造业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个案/377

第二类:建筑业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个案/386

第三类:家政服务业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个案/398

第四类:餐饮业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个案/410

第五类:销售服务业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个案/422

总报告：

长三角区域农村劳动力
的非稳态转移考察





第一部分：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稳态转移的理论探讨

一、什么叫非稳态转移

非稳态转移是本课题聚焦的一个核心。

所谓非稳态转移，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是一种区别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转移模式。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成功转移，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通过不同的转移方式，先后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全面转移，农村人口普遍降到了总人口的10%以下，并实现了全方位的市民公共福利化，我们把这类转移称之为“市民化转移”。而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同样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缺少充分工业化的依托而凸显盲目城市化的种种弊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中心城市无序流动，加之城市中就业压力居高不下，导致低收入阶层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在大城市周边出现了大批贫民窟，我们把这类转移称之为“贫民化转移”。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是在农村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暂时无法实现经济发达国家的市民化（全方位的市民公共福利化）转移的条件下，主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有序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兼职和就地转移等，尽可能使农村劳动力得到顺利转移的同时，避免农村劳动力盲目无序地流入城市，产生大规模贫民化现象的转移模式。我们将这种转移称之为“非稳态转移”。之所以称之为“非稳态转移”，是因为被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并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市民化

或贫民化的方式在城市里真正定居下来，而是处于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半定居甚至不定居的流动迁徙状态。

二、为什么选择非稳态转移的研究角度

在中共中央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农民工问题已经受到了举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非常活跃，大量研究成果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城市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涉及了农民工消费、就业、生活方式、社会网络、社会心理以及个体行为和主观能动性等微观领域。很多研究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制度批判精神，其中也有不少成果建立在非常扎实的调研工作基础之上。特别是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包括了多个中央部委、部分省（区、市）和部分专家历经10个多月，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55篇专题研究报告，对我国农民工的历史、现状、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做出了具体描述和解释，总结了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做法和经验，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原则思路和政策建议。但是，很多研究都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即在运用“二元结构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相关分析方法时，没有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与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别看待。虽然也有个别学者针对西方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但他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提高“二元结构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释力^①。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一些特点^②，还有的学者对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在解决我国就业和能源困境等问题的局限性提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并从印度孟买、墨西哥和巴西等地的贫民化流动带来的社会动荡来肯定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① 周天勇. 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思路. 经济研究, 2001(3).

廖淑华、余光英. 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及其政策含义——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一个修正. 市场论坛, 2004(8).

② 梁雄军、林云、邵丹萍. 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 2007(3).

王春光.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流动与融合, 团结出版社 2005.

的社会稳定作用^①。但现有的研究都没有深入挖掘我国农民工流动不同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特征和理论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

由于存在这样的缺陷，不少研究成果的人文关怀和制度批判显得比较苍白，给出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也较少独创性和建设性，而且长期以来，理论对现实的指导非常矛盾和混乱。一方面，不少学者基于二元结构理论的认识，大力强调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中央政府、国家各职能部门以及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政府也大多从全局出发，不断出台政策推动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地方基层政府则更多地考虑本地的就业安置能力、财政支持能力、城市综合承载力、治安和其他公共管理能力、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对市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对特定阶层和相关部门或集团利益的影响以及地方保护，结果往往导致上级政府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更为严重的是，个别研究简单套用了“刘易斯拐点”等概念，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出了错误判断，并误导有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过早推出了取消某些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和全面改善农民工待遇等一系列相关措施，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等带来的影响，立刻导致了纺织等相关产业发展的全面滑坡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我们认为，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不同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必须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非稳态转移的实际情况，参考“二元结构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相关分析方法，重新构筑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把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做出真正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安排。

三、非稳态转移模式的主要特征

与经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模式比较而言，我国非稳

① 温铁军.当前中国要在内部解决的众多矛盾.学习月刊,2006(2).

“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三农”问题专家——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 2004.

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城市与农村的困惑与反思.财经大讲堂 2006—3—12.

态转移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市场要素配置与政府调控的结合，即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机能为基础，根据经济发展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调整与改变制度安排，以调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转移方式。不管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转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化转移，基本上都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但其中的贫民化转移存在很大的弊病，特别是在大城市周边形成了大批贫民窟。居住拥挤，教育、治安、卫生等状况较差，加深了城市人口贫富的两极分化，使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因此在不能实现完全市民化转移的前提下，为了避免贫民化转移的种种弊端，政府就需要利用“看得见的手”推行非稳态转移。我国的这种非稳态转移是借助原来的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逐渐完善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被称为所谓“盲流”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处于比较放任的自发状态，但政府在逐渐让农村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有效增加收入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时期二元结构的大多数制度安排，以限制农村劳动力定居城市。当我国进入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以后，非稳态转移模式将逐渐成熟和完善，政府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定程度地改变计划经济时期二元结构的部分制度安排，改善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促进农村余留的劳动力加快转移。但在制度变革和经济规模扩展受到要素配置的根本制约条件下，并不能彻底改变这些劳动力不完全脱离农村的半定居甚至不定居的流动迁徙状态。

非稳态转移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对农村的依赖性较强，农村为已经转移的劳动力提供着重要的社会保障，是失业回归农村，以及不能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是避免贫民化转移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不管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转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化转移，农村劳动力都是不可逆的彻底转移，即使他们在城市难以生存下去，也不能重新回到农村中来。而非稳态转移却并非不可逆的彻底转移，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但仍然保留着与农村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农村一直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土地改革，让被官僚军阀地主赶出土地的大量贫雇农和无业游民等重新

回归土地,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则不仅使过剩人口完全被吸收和消化了,而且还为以后多次让城市的过剩人口向农村和农业逆向流动创造了条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完善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限制了农村土地的完全流通,因此仍然保证了农民不会因为市场化而失去农村的生存条件,当农村劳动力无法被城市充分吸收的时候,这种制度安排为他们提供了回归农村的基本通道以获得生活的基本保障,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非稳态转移模式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转移的流动性很强,农民工存在从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城市到农村、农村到农村和农村或城市的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比较频繁的多次流动。不管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转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化转移,农村劳动力都以定居城市为目的,一旦定居以后,便失去了流动性。然而在我国,由于制度和各种非制度的原因,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很难通过转移在城市定居,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经济收入。虽然他们也生活在城里,但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或多或少存在差距,不得不处于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半定居甚至不定居的流动迁徙状态。农民工的流动原因主要包括自己主动跳槽、失业后重新就业、自己创业、暂时回家休息以及回归农村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转移速度相对较快的模式,保持这样的非稳定转移状态,可以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而大幅度增加就业机会,强化劳动力要素对资本和技术的替代效应,减少公共财政和城市综合承载力负担,降低城市的管理成本和保证城市的生活质量。但这也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必然要以影响农民工的部分公共福利为代价。

四、非稳态转移的理论探索

经济学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般假设建立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能够自由流动,因此即使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等不能流动,生产要素仍然可以通过市场流动得到合理配置,实现动态均衡。例如“二元结构理论”作为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就没有考虑经济全球化中要素流动的不同步性、人口压力和生态环

境等对经济规模扩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而是仅仅纵向考察各国内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和转移效果。在刘易斯(W. A. Lewis)的“二元结构模型”(即无限富余劳动力发展模型)中，城市收入差异被认为是唯一左右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决策的因素，即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一般工资水平达到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转移到城市谋求新职业。费景汉(J. Fei)和拉尼斯(G. Ranis)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主要是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工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分三个阶段分别考察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技术变化。而托达罗(M. P. Todaro)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主要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来解释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解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例如斯塔克(O. Stark)的相对贫困假说、博格(D. J. Bogue)的推拉理论和乔根森(D. Jorgenson)的消费需求拉动学说等。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二元结构理论”模型增加了一些解释变量等，以期提高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释力。

“二元结构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具体转移决策和转移效果等确实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有助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改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果。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国家等政治制度的刚性约束阻断了这种市场流动，因此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并不能通过市场流动自由地与相应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及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中要素流动的不同步性，而且按照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还不能有效地克服这种不同步性，各种要素也不能实现完全替代。这些理论没有考虑经济全球化中要素流动的不同步性、人口压力和生态环境等对经济规模扩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也就难以区分不同资源禀赋和人口压力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定位、发展程度和发展局限，以及它们对劳动力转移模式的不同选择。按照“二元结构理论”的解释，一般来说资源禀赋较好、人口压力较轻的国家，劳动力并非无限富裕，而且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局限较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会相对比较容易；而资源禀赋较差、人口压力较大的国家，劳动力接近无限富裕，而且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局限

比较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相对比较艰难。但资源小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却告诉我们,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经济全球化中要素流动的不同步性;中国和印度等超级人口大国的发展现状也告诉我们,它们即使选择外向型经济,在现阶段也不能实现完全市民化的劳动力转移,但不同的传统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过剩压力带来的社会问题。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存在资本、技术、经济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不同步性,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因此对于要素禀赋和人口压力不同的国家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也完全不同。按照诱致性技术和制度变迁假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会导致技术和制度变迁的有效路径的差异。不同的要素禀赋和人口压力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定位、发展程度和发展局限,但该国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限制条件选择不同的转移模式,而不同的转移模式则会导致不同的转移决策和转移效果。

以中国、印度等存在较大人口压力的大国为例,有限的资源禀赋和非常严峻的人口压力,决定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大循环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处于劣势状态。如果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水平等的限制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要素合理配置就意味着大量劳动力属于过剩劳动力,无法与土地、经济资源和能源形成有效配置。按照稀缺性原理,土地和各种经济资源与能源的争夺将愈演愈烈,人口过剩的矛盾将不断被激化,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将不断扩大,农村大量弱势群体在竞争中将逐渐失去土地和其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得不无序地涌入城市,形成贫民化转移。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国际资源、能源和劳务输出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经济全球化中要素流动不同步性的制约,但这些方式要受国际市场需求、国际要素流动竞争、国际政治结构和政治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完全缓解这些人口大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实现市民化的完全转移。因此这些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多数仍然可能无序地流动到大中城市,并大量沦落为城市里的贫民。但如果通过一定的传统文化、宗教或政治的制度安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转移速度和转移方式,减少贫民化流动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困扰。